

中国中青年
教育学者自选集



思潮涌动与教育变革

阎光才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

思潮涌动与教育变革

SICHAO YONGDONG YU JIAOYU BIANGE

阎光才 著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编委会名单

主 编 石中英

副主编 唐玉光 程斯辉 司晓宏 王本陆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鲍康健 程斯辉 钱志亮 石中英

司晓宏 唐玉光 王本陆 王 晨

吴寿兵 杨多文 殷振群

APU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潮涌动与教育变革 / 阎光才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11

(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 第三辑 / 石中英主编)

ISBN 978-7-5336-5399-6

I. 思… II. 阎… III. 教育学—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0144号

出版人:朱智润

策划编辑:殷振群

责任编辑:殷振群

技术编辑:王琳

装帧设计:袁泉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经销:新华书店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安徽天歌印刷厂

开本:720mm×960mm 1/16

印张:22

字数:310 000

版次: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 000

定价:40.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话:(0551)3683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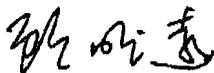
总 序

当《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一辑十本专著放到我面前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兴奋不已。回想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全国从事教育理论工作的只有四百多人。为了繁荣教育科学,当时我们呼呼恢复中央教科所、建立中国教育学会,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批准。今天中国教育学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八十多万人,全国博士授权点已有几十个,一批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已经成为教育科研的骨干。《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就是他们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成果。怎不令人兴奋!

我与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是有感情的。回想18年以前,1989年他们在大连召开第一次会议,要求成立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众所周知,那时的形势,有些同志有点害怕。但是中国教育学会的老会长张承先同志还是比较开放、很有远见的,认为应该支持中青年这种合理的要求,中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教育科学的繁荣要靠他们。学会就让我来联系这项工作。我也认为,中青年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过去开会,总是老专家占据了讲坛,没有中青年学者讲话的机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的成立给中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讲坛。在研究会成立之前,做了几年准备,每年都由我主持年会,以中青年理论

工作者为主,也请一些老专家参加,互相讨论,相互学习,效果很好。1993年正式成立了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我完成了历史使命,就由他们自己组织了,我虽很少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一直关心他们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看到他们的成长,我的喜悦的心情是难以言状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空前的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实践呼唤着教育理论的指导。教育科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教育理论还远远不适应教育的需要。我们还需要努力,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要吸收外国先进的理论和经验,但重要的是要深入我国的教育实际,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为建设我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我祝贺她的出版,并希望有第二辑、第三辑问世。



2007年10月30日

于北京求是书屋

目 录

第 一 编 思潮与纷争

- 001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的危机
- 015 美国心灵的开放还是关闭?
- 026 20 世纪大学普通教育思想回顾与评析
- 038 以“政治正确”的名义
- 045 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学术观

第 二 编 知识与方法

- 054 教育过程中知识的公共性与教育实践
- 068 开放中的人文社会科学与教育学
- 079 教育研究中量化与质性方法之争的当下语境分析
- 095 也谈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真实”
- 107 教育评价的正当性与批判性评价

第 三 编 Town & Gown

- 120 斯坦福的硅谷与硅谷中的斯坦福
- 133 牛津大学与牛津城
- 143 城市社会中的高校群落现象透视
- 157 中关村高校群落、文化生态与功能定位

- 170 中关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84 大学、城市与社区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第四编 反思与批判

- 196 批判教育研究的学术脉络与时代境遇
209 你站在谁的一边?
217 美国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基督教“政治”
230 子宫、语言与政治
237 教育的生命意义

第五编 教育与生活

- 247 教师“身份”建构的制度与文化源考及其当下危机
259 回归日常生活的教育
281 教育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制度化内涵
296 控制与反控制:在虚拟与现实的网络中生存

第六编 制度与理性

- 312 教育的功能、功用到功效
324 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反思
333 我国学术环境的整体优化与高水平大学的发展
344 后记

第一编 思潮与纷争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的危机^{*}

在如今整个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源自古希腊的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传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予以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或许不是有着 800 多年传统的欧洲老校,而是当下新保守主义风头正劲的美国。尽管对于自由教育究竟该做如何理解,众多的美国学者对此也理解不一,并在其中揉入了各种美国所特有的实用主义成分,如目前在学术界依旧如日中天的自由派新解:自由教育就是一种推崇多元价值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但是,眼下试图以道德至善、经济自由而君临全球的美国共和党政府得势,揭示了一个或许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作为一个曾经以多元文化熔炉标榜的典范,美国正与早期威尔逊政府推销的多元共存的国际主义秩序渐行渐远,一个绝对和一元的新帝国形象正愈来愈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它同时表明:自二战以来,美国自由派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理念,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危机。本文便就此尝试对这一危机生发的文化背景、历史脉络予以全面的梳理。

一、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内在冲突

美国颇为自负的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其皇皇巨著《美国人》中曾言,不

^{*} 原载《高等教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可否认,美国文化的起点是欧洲正统的加尔文清教传统,但是,早期移民来到新大陆时所面临的艰难困境,迫使他们不得不注重实际,宾州贵格会至善论在现实中的到处碰壁,佐治亚州宏大社会福利计划的乌托邦蓝图破产,都预示着在这块新大陆上,一种求实、顺应自然和诉诸自明之理的新美利坚精神即将破土而出。这种精神状态基于两种看法,一是“人们为其行动提出理由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为错误或未知的理由而行动得当胜过以模棱两可的结论去掩盖一种体系化的‘真理’;深沉的反思并不一定产生最有效的行动”。二是“经验的新颖之处必须自由地融入人们的思想”。^① 这也就是说,从清教徒踏入美洲大陆的那一刻起,“行动”和“经验”就已经成为他们摆脱英国保守的和欧陆玄思文化传统的双桨,由此几经辗转和历尽艰辛的破浪涉水,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他们方才弃船登岸。于是,此番苦苦挣扎经历经过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等的精心总结、概括、抽象和理论化,一个彻头彻尾体现了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理论体系瓜熟蒂落。

美国大学所独有的自由教育理念,就是伴随着实用主义哲学这一瓜熟蒂落的过程而浮出水面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哈佛大学校长埃略特,第一次为老欧洲大学中传统的自由主义教育模式(即美国的耶鲁模式)敲响了丧钟。埃略特提出,传统的以古典课程为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并注重人的精神训练的自由教育模式,对于现代美国人没有丝毫实践价值。在他看来,为适应美国当时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同时维护社会民主制度,年轻人“除了需要选择一门学科通过全面的学习以为未来的职业做准备以外,还应拥有反映人类情趣的所有学科领域的通识性知识(general knowledge)”。^② 1909年,埃略特的继任者洛厄尔上任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大学应该实施的是“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在此,洛厄尔第一次对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

① 丹尼尔·布尔斯廷. 美国人:殖民地历程. 时殷弘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00.

② Ernest L. Boyer and Martin Kaplan. Educating for Survival. Change Magazine Press, 1977:29.

tion)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传统的自由教育是贯穿于本科生教育的全过程,而通识教育的目的则在于开拓学生关于知识的深度和广度。^①很显然,埃略特和洛厄尔所倡导的通识教育,在本质上已经与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分道扬镳。它尽管多少带有一定的价值偏好,如洛厄尔所言,其目的在于塑成美国的共同特性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相对一致性,但是,由于它更强调其作为专业化前期的知识准备,因此,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伴随后期大学四分五裂的专业化格局形成和知识整体性的瓦解,“通识”本身也将成为一个问题。1946年哈佛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红皮书改革不幸夭折的命运,或可足为佐证。50年代在科南特倡议下的哈佛综合课程改革,其实也不过是洛厄尔通识教育理念的延续,红皮书针对当时美国社会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多元文化价值并存的格局,以及欧洲法西斯独裁所带来的世界性灾难的惨痛教训,提出要在大学中通过设置综合课程实施通识教育。所谓“综合”包括三部分课程:经典名著、西方思想和制度、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对于这种综合性的通识教育课程模式设计的基本精神,博耶(Ernest L. Boyer)等人将其归纳为遗产(heritage)和变化(change)、民族共同特性(commonality)与多样性(diversity)。对于上述原本就存在矛盾和冲突的范畴,胡克(Sidney Hook)质疑道:这种设计其实暗含了一种不切实际的信念,它企图把本来就无法协调的成分编织为一个综合体。^②而事实上,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在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在科学所尊重的事实与人文主义所推崇的精神价值之间、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中心主义的认同和少数族裔的多元价值认同之间,都永远存在着无法消解的内在张力。因此,红皮书所倡导的通识教育不仅在哈佛难以为教师所认同,其综合课程最终难逃夭折的厄运,而且颇有反讽意味的是,经过这一个各种异质成分的“综合”,哈佛反而成为一个对多元价值有着极其大度的容忍和宽容精神的自由派大本

^① Ernest L. Boyer and Martin Kaplan. *Educating for Survival*. Change Magazine Press, 1977: 31.

^② Ernest L. Boyer and Martin Kaplan. *Educating for Survival*. Change Magazine Press, 1977: 41-42.

营。直到今天,它所谓的核心课程与其说是“核心”,还不如说是各种普通文理知识的大杂烩。

20世纪的60到70年代可谓是美国高等学府中自由派气势如虹的时期,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的社会背景下,美国大学自由教育的价值取向开始真正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传统和共性更多地成为人们批判和拷问的对象,相反,变化和多样性在人们看来更能反映民主社会的本质。强调变化和多样性一方面把边缘和弱势群体的文化和价值诉求提升到与传统主流价值平等的地位,从而带来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全面扩张;另一方面,在纷乱、多元的价值导向下,与美国社会当时混乱的社会情景相仿,自埃略特以来的美国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大学通识教育也在课程的膨胀中走向了混乱和无序。这种格局难免要触动一些保守主义者始终敏感的神经,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向右转”的整体趋势后,自由派的“多元并存”也开始受到严峻的挑战。

二、新保守主义及其大学自由教育的主张

1983年,一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荷西(Jr. Hirsch)在其《文化遗产》中,首次向自由派的教育主张发难。他谴责道,由于目前大学缺乏共同的课程,美国社会正面临着丧失它的“文化凝聚力”的危险。为此,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把更多的学生同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以及那些让我们凝聚于一起的理念联系起来。”然而,什么是美国的共同文化?卢卡斯(Christopher J. Lucas)认为,荷西的主张其实与美国著名的永恒主义代表人物艾德勒(Mortimer Adler)的思想一脉相承。^①提到艾德勒,这里就不能不说起30年代芝加哥大学年轻的校长赫钦斯。赫钦斯曾经以永恒主义享誉当时的美国大学教育界。他认为,大学应该开展普通教育,普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他看来就是训练人的理智,理智也即是美德,这种理智精神来源于西

^① Christopher J. Luca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4: 296.

方的传统,因此,也只有回归到传统当中,通过设置以西方经典名著为主的课程计划,才能达到教育是培养人理智的美德的目的。为此,他与艾德勒一起在芝加哥大学精心构建了一个百卷名著计划。尽管该计划在芝加哥最终还是破产了,但是他的大学普通教育思想却由此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得到部分高校的认同。直到今天,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劳伦斯和圣·玛丽等大学或学院还依旧保留西方名著教育培养计划,赫钦斯功不可没。而更意味深长的是,此后被称为共和党教父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以及众多如今政界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如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均出自芝加哥,以至于使人感觉到芝加哥俨然是新保守主义的大本营,看来这都并非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列奥·斯特劳斯在如今的美国可不是一个寻常人物。作为一位二战期间从德国避难于美的学者,他在4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虽然还名不见经传,但如今在共和党主政的时代却光芒四射、声誉显赫。斯特劳斯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相信人类社会存在普遍的绝对一元的价值标准,而这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必须回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文化资源而不是霍布斯以后的近代才能找到,如苏格拉底关于人类幸福完满生活、柏拉图对普遍正义和善的理解。他认为,普遍的正义来自“自然法”,而不是自霍布斯后近代政治哲学转向中的“权利”。与赫钦斯的主张一样,斯特劳斯也主张大学的自由教育只有回归西方传统,才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理解西方文化的“文化人”。正如他在1959年一个关于《什么是自由教育》的演讲中所提到:“自由教育就是关于文化和指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最终产品就是有文化的人。”然而,什么是文化?斯特劳斯不无讥讽地指责到,自由主义或者相对主义关于多元宽容的观点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无异于在说:文化就好像“对花园的培育可以由园子里的垃圾,由那些空的锡杯和威士忌酒瓶,由那些写满字的被随手扔在园中的废纸构成”。因此,他认为,自由教育要提供给学生好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本质上还是西方文化。尽管其他文化也可能有可取之处,但是,我们困守于语言而别无选择。故而,真正的自由教育就是要人们去与西方传

统中的伟人们精神进行交流,去倾听伟人的思想,在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的交流中,达致“完美的人格”和“人性的卓越”,“养成我们的谦逊而不是谦卑”,“培养我们的勇气并以此冲破知识分子以及敌人的浮华、廉价、喧嚣、鲁莽和无知的世界”。说到底,“自由教育就是赋予我们以对美好的体验”。^①显然,如果说赫钦斯关于普通教育的经典尚且是西方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所有名著,那么,斯特劳斯则更进一步,他主要指涉古希腊的传统。换言之,比起赫钦斯的理性主义,斯特劳斯的教育主张则更具有一种保守主义、古典主义和绝对主义色彩。

斯特劳斯关于自由教育的保守主张虽然在六七十年代被风头正劲的自由派势头所盖过,但是他却成为一股潜流,一旦时机成熟便迅即蔓延开来。在80年代整个美国“向右转”的大背景下,它便迅即浮出水面,除上述所提到的荷西以外,最著名的保守主义自由教育代表人物莫过于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布鲁姆是斯特劳斯的大弟子,深得真传,在80年代他以一本《美国精神的关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而名噪一时。在该书中,布鲁姆一方面以其深厚的西方哲学家底,历数美国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中崛起所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罪恶,进而痛责道:“六十年代为大学带来的是万劫不复的灾难”,“我所听到的诸如‘伟大的开放性’、‘更少僵化’、‘摆脱权威的自由’等等,所有这一时期所谓好的东西都空洞无物,根本不能体现到底什么应该是大学教育的观点。”^②另一方面,他又对整个8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予以激烈的抨击,认为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一个职业研习所,学生为职业而来,教授们都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目光狭隘,既不关心不同学科和领域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不能对学生的人生与关于民主生活的价值困惑提供指导,“而最严峻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好的伟大名著抱以拒斥的态度”,在他看来,所谓自由教育就是要学生仔细研读那些被普

① Leo Strauss. 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Tenth Annual Graduation Exercises of the Basic Program of Liberal Education for Adults. 1959, (June 6).

②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by Saul Bellow, 1987: 320.

遍认可的经典文本，“这些伟大的书籍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只有在这些古典文本中，学生才能感受到如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中它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深刻内涵。“一个好的自由教育计划，就是要培养学生对真理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激情，对每所大学而言，根据自己的特定条件设计这样一系列的课程并不是难事……难就难在教师不能接受它。”^①为此，布鲁姆指出，当代人类可能生活在一个相对于其他任何时代更需要真诚地阅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时代，这些经典的客观与真实之美依旧存在，因为她们反映了人类的本质。而人类的本质具有共同性，因为至少在当代，我们人类依旧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这里所谓共同性，就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对善的共同关注，它是“唯一真实的友谊”，是“唯一真实的善”。而在如今更需要哲学、一个属于美国的时代，美国的大学就应是一个一致性与友爱共存的场所，它应该承担起如政治上对整个人类世界自由之命运的责任。^②

如果说荷西和布鲁姆仅仅是站在学者的立场来为大学自由教育“回到传统”而营造声势，那么，里根时期的美国教育部长贝奈特(William J. Bennett)则作为政界知名人物与之遥相呼应。1988年贝奈特刚一出山，就在西海岸少数族裔居多的知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是年，斯坦福大学教师们要求将一门一年级本科生必修的名为“文化、理念和价值”的“西方文化”课程(80年代初，名为“西方文化”，后在学生的反对下更名为“文化、理念和价值”)，用不再强调15本经典名著的“妇女、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课程来替代，对此，贝奈特大为不满，他谴责教师们的动议是把大学课程平庸化、琐碎化，而斯坦福的教师们也反唇相讥。该事件由此而在全美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笔头大战，诸多大的报刊媒体都参与了论争。^③参与这一论战的不仅有激进的左翼，更多的是作为美国学术界主流的自由派，也就是由此开始，与美国政治、文化界中的情形一样，关于自由教

①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by Saul Bellow, 1987: 340-345.

②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by Saul Bellow, 1987: 380-382.

③ Christopher J. Luca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4: 296.

育的保守派与自由派持久论争也不妨称之为“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高等教育界也拉开了序幕。在美国,贝奈特一向有传统与道德的卫道士之盛名,他所撰写的少年儿童读物《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曾长踞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译成多种文字。^①然而,也是这位所谓的“当代美国的道德沙皇”,最近却闹出了在基督徒看来十恶不赦的道德丑闻。据《华盛顿月刊》报道:“在过去的十年间,贝奈特至少到过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赌城消费了十几次,在此他被视为少数‘最受偏爱的消费者’之一,据有关资料和证据表明,贝奈特在赌博中总的损失高达800万美金。”文章就此嘲弄道:贝奈特先生在他的巡回演讲中,出场费为50,000美金,在演讲中他对各种罪恶以及现代文化的缺点和堕落深恶痛绝,然而,在贝奈特先生的罪恶名单中,赌博却不在其列。^②这也许是对一位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再妙不过的讽刺。

三、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究竟会向何处去

关于美国大学的自由教育取向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可以说它是反映特定时期美国文化和政治转向的晴雨表。20世纪初,取代了自由教育的普通教育概念浮出水面,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美国实用主义本土文化开风气之先的时代背景。也正是因为对老欧洲传统的彻底反叛,才促成了美国后期激进主义文化的崛起。它虽然发端于世纪初,但是直到60年代方才达到巅峰。作为这场规模空前的文化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美国大学中自由派和左派精英知识分子逐渐站稳了脚跟。然而,在此整个过程之中,保守主义并未真正放弃自己的阵地,正如艾德勒所言:如果说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是对极端乏味和空洞、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的传统教育的反动,那么,这种反动到了40年代,它却把美国教育带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因此,现

① 该书也被译成中文,由中国编译出版社2003年出版发行。

② Katharine Q. Seelye. William Bennett Reportedly Lost Millions Gambling. The Atlanta Journal, 5/3/2003.

在像是钟摆向回摆动的时候了。对于进步主义的主张,永恒主义并非是彻底的抗拒,而是对它误读传统的一种修正。在他看来,这种修正就是一种在传统和变化之间持中间立场,重新理解经典在当代的现实价值和意义。^①不幸的是,四十年代甚至到六十年代还远不是一个需要反思,而毋宁说是一个依然让人对变化感到亢奋的高歌猛进时代,这也是为何列奥·斯特劳斯在美学术界长期默默无闻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在经过60年代的激进文化革命之后,面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和相对主义全面泛滥,美国社会中吸毒、堕胎、种族暴力、枪械失控、儿童色情、同性恋和家庭暴力等有违传统基督教道德等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大多社会中上层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保守主义者借机祭起“启蒙”的大旗,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在突然之间异军突起。里根的共和党政府崛起就是这一风向转变的产物。不过,此时的保守主义已经是非彼时的保守主义,相对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新的保守主义者们采取了一种与对自由派的多元宽容和左派的激进绝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如库尔斯(James Kurth)1992年在新保守主义的期刊《国家利益》中撰文指出:在当代,美国需要再进行一场新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不仅通过强调遗产的传承而且还要依靠美国化的大众教育重塑美国共同、一致的文化,恢复它曾经在世界舞台中的主导地位。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库尔斯在此所谓的信念就是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统治精英、物力、暴力、金钱和文化整体性的基础之上。^②库尔斯这里所谓的战争其实就是文化战争,它的矛头所指即是在国内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左派的平等主义,在国外,就是另两位著名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亨廷顿的与西方文化相冲突的其他文明,弗朗西斯·福山与美国民主相悖的政治制度。它的观点虽然极端并且在大学中很难有市场,然

^① Mortimer J. Adler. *The Crisis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The Social Frontier*, 1939, (February, Vol. V, No. 42): 140.

^② Edited by Jodi Dean.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71—72.

而如甘阳所认为的,在80年代后的美国大众中却很有蛊惑力。^①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财大气粗的右翼传播媒介不遗余力的支持。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极端的新保守主义关于大学自由教育回到经典,而不是回到美国自身传统的极端倾向,在80年代后渐成气候,除荷西和布鲁姆的外,还有相当多的各种相关的出版专著纷纷出笼,如威尔斯希尔(Bruce Wilshire)的《大学的道德崩溃、专业主义、纯净与冷漠》,史密斯(Page Smith)的《扼杀精神:美国高等教育》,金伯(Roger Kimball)的《终身制的激进分子:政治是如何搞跨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波珀(David E. Purpel)的《教育中的道德和精神危机》等等,这些论著都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次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实际并非是美国传统如耶鲁的中庸保守主义的复兴,用艾德勒的钟摆理论,它其实意味着新保守主义的主张走向了钟摆的另一个极端。显然,对于这种盛气凌人的宣战,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都不会无动于衷。从80年代一直到小布什入主白宫后的今天,随着911恐怖事件后国际形势的逆转,这种双方论争火药味日渐浓厚,甚至到了相互谩骂的程度。早期曾经作为斯特劳斯弟子、布鲁姆同学,但后来却成为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罗蒂公开表示:对于布鲁姆、贝奈特和荷西等人的主张我会肆无忌惮地嘲笑。斯坦福的普莱特(Mary Louise Pratt)教授责难道:“布鲁姆之流珍视一种狭隘、具体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被认为是普遍的可以为每个人所享用,然而,它实际上只属于那少数在语言风格和族类上具有一致性的有地位的世袭阶层。”显然,它是带着种族主义的标识,“很少有人会质疑贝奈特和布鲁姆的意图并非是美国关闭美国人的心灵,而是美国的大学”。普莱特哀叹道:这分明是“西方无情帝国主义的扩张”。毫无疑问,布鲁姆的著述在“知性上是极糟糕的”,而贝奈特的《回到遗产》则简直“更是糟糕透顶”。著名的左派教育学家吉鲁(Henry A. Giroux)则抨击道:“在更一般意义上,布鲁姆和荷西代表着新的精英主义在

^① 甘阳. 政治哲人斯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施特劳斯文集》前言.
<http://law-thinker.com/detail.asp?id=1602>